

口述

生产队

□ 王栋

“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生产队，我一直对这个词怀着深厚的感情。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那一代，有谁不知道生产队呢？”

这是作家付秀莹小说里的句子，这几句话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是70后——我记事的时候，生产队还是具体的、有形的，还有模有样。虽然我只抓住了生产队的一个尾巴，但是，我儿时的记忆，跟生产队里的那些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老家在茌平区冯官屯镇望鲁店村。当时，我们生产队除了家北、东洼、顶河、河东这几百亩土地，还有队部——队部里有油坊，以及草屋——实际上是牛棚、猪圈、场院、仓囤的统称。草屋在村外寨壕的北面，是我和小伙伴经常去的地方。我对这里充满了好奇。我记得队里有几头健壮的鲁西黄牛，腆着大肚子，脾气暴躁；还有白嘴唇的大叫驴。牛棚里弥漫着青草味、屎尿味，湿漉漉的。在草屋西头儿的几间房里，队里还养着蚕——白石灰粉刷的墙壁，白胖胖的蚕宝宝在竹匾上的桑叶堆里弓着身子。蚕室里很静，静得只听到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沙”声。蚕室里有一种甜甜的、腥腥的动植物混合的味道。病了蚕宝宝则被挑拣出来，和黑色的蚕粪、残缺的桑叶梗一起被遗弃在道边。那些蚕宝宝还没有死去，它们翘着脑袋，还在寻找桑叶吃。我和小伙伴可怜它们，便把它们带回家去，喂养几天。

草屋后面是偌大的场院。夏季的麦子，秋季的棒子、红薯、高粱、大豆、棉花都集中到场院里碾轧或者晾晒。麦子收完了，一个个馒头样的麦秸垛林立在场院里，像一座座城堡；秋季，棒子秸相互依偎在一起，也成为一座城堡——这里是捉迷藏最好的藏身之处。一到冬天，场院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在这里，我们捉迷藏、打杂、跳房子……

生产队里还有菜园瓜园。菜园在东洼，离村子有三四里路。菜园里有一间小土屋，有前后两个门，这样便于观察菜园的情况。屋前是一口旱井，井口很大，站在井边往下看，不免让人心惊胆战。井壁是用大青砖垒成的，井水不算深，非常清澈，有几根柴草浮在水面，还有一两只青蛙伏在井壁，伸着长长的后腿。小伙伴投个坷垃进去，青蛙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了。井上面有水车，蒙着眼睛的黑驴周而复始地拉着水车，它前面的路永远没有尽头。水顺着阳沟缓缓流进韭菜地、茄子地……

瓜园好像在家北，种着甜瓜、面瓜、梢瓜。面瓜一兜儿面，瓜瓤是甜的；青甜瓜名字叫羊角蜜，又脆又甜；梢瓜，浅绿色，大的像成年人的胳膊一样粗，脆脆的、微甜，老了的则有点儿发黄，吃起来有点儿酸。现在，梢瓜不多见了。瓜熟了，队长就举着喇叭筒子喊，分瓜啦，分瓜啦，都去领瓜啊！我们小孩子耳朵尖，听到喊声就往瓜园里跑。于是瓜园的窝棚前就挤满了一排小脑袋，分瓜前，我们的口水，早已吞咽了很多。

偷瓜？那个年代的人谁没有偷过瓜呢？我的偷

瓜经历在脑海里是空白的。娘笑着跟妻子讲我的偷瓜故事——打小就笨，跟小伙伴一起去偷瓜，人家都拿着一个大甜瓜，他两手空空，人家吃，他干看着。

那时，生产队在村子里还有一口水井，全队的人都去这口井里挑水。若是水桶掉到井里，就用杀猪时用的肉钩子去捞。有不懂事的孩子往井里撒尿或者拉屎，被人看到了，那个熊孩子除了挨骂，还要挨打。水脏了，全队的老少爷们就去淘井，把水一桶桶提上来，还要下去把井底的脏物清理干净。

队长是生产队的最高首领，权力的象征则是一口钟。钟声响起，是上工的号角。社员（那时人民公社还没有改名为乡镇，村民都叫社员）便在钟下集合，队长掐着腰，神气地派活儿，然后人们拿着生产工具奔赴各自的岗位。集体劳动我没有参加过——我还没有长大成人，生产队就解散了：土地包产到户，牲畜农机具拍卖给社员，草屋被扒掉，场院上多出一片红砖新居。70后成了见证生产队的最后一代——它以后改名为村民小组，以另一种身份存在，但已经不那么具体形象了。据说生产队解散时，不少人都流下了热泪。但很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让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生产队，渐渐成了遥远的回忆和背景。

有位作家说过，我们怀念一个时代，不是它有多好，而是那时我们年轻。

生产队，在我被岁月冲刷的记忆里，有它的片段。那里，住着我的童年。

60斤地瓜干

□ 刘旭东

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几十年来经济状况一直不怎么样。我曾有过少数几次向人借钱的经历（当然都早已还清），也为此有过感动。但最让我感动、记忆最深的是我借给别人60斤地瓜干的经历。

我的老家在临清市金郝庄镇。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这里因连年干旱和生产所限，农民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那时得到了最真切的体现。

1972年春天，我和本乡李寨村一位姓段的大哥在公社宣传队里排练节目。段大哥多才多艺，吹拉弹唱写画无所不能。段大哥饰演话剧《收租院》中的瞎老头儿，他的表演惟妙惟肖，台下观众感动得纷纷落泪。他自编自演的表演唱，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可是，正应了那句老话：“百巧百能，误不了受穷。”一天上午排练节目的间隙，我看到段大哥在一间屋子里趴在桌子上刻钢板，就和他聊起天来，方知，在段大哥青春意气的背后，还有着难与人言的苦痛。他因弟兄多、老人多病，家里生活条件一直很差。他身为家中老大，自幼从外地来我乡跟着外祖母生活，在一千七百年人的大村里是独门独户，总免不了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那年他刚结婚，婚礼操办得十分简朴，甚至新娘的红衣绿裤都是用一毛五分钱的“洋色”（一种民间染料）加工染制的。他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身无分文。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家的面缸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饿肚子的危险就在眼前。

那时，我是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毛头小伙儿，也不知什么叫雪中送炭，况且自家也不暖，有点儿

“炭”也送不起。可不知为什么，我却突然对他说了句：“大哥，你到俺家去驮点玉米吧，我见俺家大缸里还有不少哩。”段大哥突然停住手里的铁笔，坐直了身子，有点诧异地看了看我，低下头，轻声说：“好，我看情况吧。”稍停，他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真是谢谢你了，旭东！”

没过几天，段大哥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来我家了。他坚持不要玉米，而是从我家房顶上装了一布袋晒好的生地瓜干，称了称，60斤整，然后驮走了。那年月，因为地瓜高产，生产队里每年都种很多地瓜，然后分到各家，切成片晒干后推到石头碾子上碾碎了蒸干粮吃，或直接煮着吃。

忘了是几年以后的哪一天了。当时我没在家，在临清城里一家中型棉厂干临时工，当警卫。回到家，母亲对我说：“李寨你段大哥来过了，还了咱六十斤地瓜干，还给送来一副‘四扇屏’，你看看。”我接过那副“四扇屏”，打开一看，是段大哥自己书写、装裱的四幅书法作品，分正草隶篆四种字体，字旁分别配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图。我分明看到了段大哥倾注在里面的番心意。

后来，段大哥每逢年节必来看我的父母，这四十多年以来我俩一直保持着淡如水般的友谊。他有力气，心灵手巧，帮我家干过农活儿，当过喜事上的厨师，修理过桌椅门窗，给我们全家拍过珍贵的黑白照片，帮我修理过乐器制作过琴盒，甚至去年夏天他把亲戚从千里之外的青岛给他寄来的海鲜，给我送来一部分，还亲自蒸熟了看着我吃下去……他经常对我说：“旭东是我的恩人！”

我至今仍感动着，感动于这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人间事真是难以说得清，那样一

次微不足道的外借，竟成就了这么一段终生不渝的友情。



20世纪90年代初，莘县一户家庭在晾晒地瓜干。

张黎 摄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